

阎纲编稿

文/黄毓璜

我比阎纲年齿小不很多,资历却相距老远,过从难说密切,却又因缘几度重逢;见了面抑或打个电话,称呼上就屡犯踌躇。称阎老不得体,你知道的;呼老阎不合适,你会理解;先生吧,显得生分些;同志呢,过于严肃了。嘴上没喊过老师,乃避装嫩之嫌;心底里早经认定,在我从文之路上,他是实实在在的在在的老师。

从阎纲的论文到他的散文,几十年一路读来,固属有种种人格并文格魅力的双重领略;那等挤不出水、点得着火、扬得开血性、撑得起傲骨的文字,固属为之倾心;只是我愿意说,更为亲切的记忆,存乎作为编辑家的阎纲。

先后在八家报刊当过编辑的阎纲,其时在复刊不久的《人民文学》,那次从寄达编辑部的来稿堆里,选出了我的一篇文章。收到署名的信函已属望外,发到他主持的“学点文学”专栏,就该说“莫名惊诧”了。须知为这一栏目撰文的皆名气大大的学者,让我这个在偏远小城的小教员跻身其间,这“格”就“破”大了去了。

或许这只是一位正直编辑“不问门第、不计亲疏”的品格,可对一个普通投稿者的鼓舞非同寻常,内心感戴不言而喻。后来自责过,当时真不懂事,连封信也没回复过去。阎纲自然依旧对这个投稿者陌生,乃至日后还弄出点笑话。

“日后”云者,阎纲已到了《文艺报》社。编辑部为组织培养批评力量,策划举办长篇读书班。我在小城收到邀约通知,第一次进京也是第一次面见阎纲。上面所说的“笑话”,是几日后从他那里得知。“知道那日你来报到,我和刘锡成为什么‘相视一笑’吗?”原来,确定与会者名单时,“顾名思义”把我当成了女性,安排房间时门上贴的两个名字,另一位便是女士。弓得那位因事未能出席,避免了会带来的一阵尴尬。

事实上,读书班实到的八个人,名气无可稽考者占了多数,唯其如此,大家都有些兢兢业业的珍惜并心心念念的认真。近四十天里,读了各大出版社新出的长篇,隔几日便做些不拘形式的交流研讨。回望那段紧凑而宽和、激越而素朴、属于文学而多所体悟的日子,至今眷恋不已。

读书班也是写作班,大家都自觉交出“结业论文”似的去完成一篇评说文字。我在一篇忆旧文稿里记述过:

可能选题偏大驾驭乏力,我写得很不顺手。勉强成篇后自知不能及格,未料回来不久,那篇文稿被寄了过来。阎纲执意由他动手修改这篇作者自己否定了的稿子,而且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添加了许多文字。曾读到阎纲的一篇文章,说当年侯金镜先生“为了修改

我的一篇文章,他熬得两眼红肿”,我不知道阎纲那回是不是也为我熬红了眼,却清楚地记得:把那改得一片红的稿纸一页一页翻过去的那一刻,想见一个编辑心血的倾注。

当时,细研过多处改笔,真就是删则令繁缚尽去,增则使生面别开。那等竭智尽力,与其说让我一度收获度人金针,不如说从为编之道、为文之道上给我高标了风范。却顾所来径,深以为若说自己在文学批评上有过长进,诸多动因不能不先自归结向那个“黄埔一期”的策励和熏染。

多少年来,阎纲在《评论选刊》《文论报》以及由他编选的丛书中多次选编过我的文字,知道他一直有所关顾却依旧疏于联系,偶尔见面也绝口不道那些扶掖于我的往事。只是在他那篇《文艺报四条汉子》里,提到“黄埔军校”并开列出一些名单,“这批中青年评论力量在新时期为创作披荆斩棘,蔚为大观”,他如斯评价一个批评群体的时候,该是流露了作为编辑家的一泓守望精神和几多心灵慰藉。■

还记得那年春天

文/张伟勃

第一次听到汪峰的《春天里》这首歌,是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墨西哥高原上。那年春天,我还在墨西哥游学,在一个游兴大涨的周末与朋友们一道出游,从墨西哥城前往邻近的古城塔斯科。开车带我们的,是在墨西哥侨居多年的老刘。高速公路在群山间蜿蜒起伏,一路弯道不断,听着车载CD里播出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老歌,昏昏欲睡时,一个男人的破锣嗓子悠然响起,振奋了我们的神经:“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/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/没有信用卡没有她/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/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……”

一曲播完后,大家强烈建议老刘再放一遍,再多放几遍!老刘说,我最喜欢这首歌了。汪峰的破锣嗓子在美洲的群山间再次响起,车里有人跟着轻轻哼唱起来,我开始细细品味每一句歌词。

乐声里,老刘一边把着方向盘,一边跟我们讲述他的许多年前的春天的人生故事。他出身于山东农村,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内大学毕业后,学了点简单的西班牙语,就只身来到墨西哥,一边打工一边读博,苦熬多年才终于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。成为刘博士之后,他任职于墨西哥政府经济部,一路干到某个部门的主管,发愤任凭自己干得再出色,怎么也升不上去了。

是什么原因呢?我问。老刘指指自己的脸说,就因为这张黄种人的脸。

原来,在看似混血多元的墨西哥社会,一直存在着隐性的种族歧

视,白人高层向来是对所谓的“有色人种”不加信任乃至存有戒心的。老刘觉得在墨西哥政府里没前途,辞官而去,回到他的母校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书,终成这所名牌大学的唯一一位华人终身教授。

山间公路上疾驰的途观车里,汪峰还在继续演唱:“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/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/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/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……”

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老刘这么喜欢《春天里》。它让他想起了自己寂寞打拼的岁月。如今功成名就,回望过去,再苦再累也觉得温馨。那是他一去不返的青春,尽管一无所有,尽管有那么多的艰辛,现在想起来依然是快乐的。到了他这个已过不惑的年纪,遍尝人生各种滋味,是不是已经获得了平淡的心境,可以释然而笑着风云了呢?

不是的。老刘说,你听歌里唱的:

“凝视着此刻烂漫的春天/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/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/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/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/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/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/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……”

他说,都说四十不惑,在我就不是这样,我就感觉自己越来越迷惘。接着他沉默了,继续专心开车。为什么迷惘呢,是出于对时光不可倒流的恐惧?是忧心于人生的无常?还是出于时时袭来的思乡兼怀旧的情结?不得而知。我侧过头去看窗外,山花正烂漫。■

颐和路2号

文/王诗茜

颐和路2号贴着颐和路4号,探头望下去,院子真寂寥,广玉兰站在那里,像个常年不洗澡的男人,脏兮兮地高大着。

在2号上面这个老旧的编辑部,几乎每天都是一样的,隔着一道毛玻璃,梁晴慢慢地翻阅稿子,又或者间或地想着事儿,窗外枝叶繁茂的榆树绿成不用拉的窗帘,一切光影揉成静谧的色调,轻盈地笼着她的侧脸,缓缓的,不动的。花玻璃太薄,每天听得见她翻稿子的声音,谈论新消息的声音,给老父亲打电话的声音,有时候说到自己做了花卷,有时候说到妈妈不稳定的情绪,有时候说到家门口的猫,有时候说到潮热的天气不妨晚上开窗……让人想到她的“百味人生”,那些家常的,清淡的,不温不火的,又蕴藏着生活的力量和深沉情感的文字。

也常常会有陌生的人出现在门口。他们是来送自己写的文章。有些大老远地坐了火车还是汽车来,有些骑着自行车穿越了整个城来,无一例外地说刚好路过,其实,大多是专程而来,端着塞满报纸信纸草稿纸的塑料袋或者“上海”皮包,定定地辨认门上的铜牌。

我正好看到的一个,穿一身蓝西装,裤腿上却全是泥,从苏北哪里专程跑来,浓重的口音,局促地钉在门口,说要见主编。我说主编今早没来。他轻飘飘地迈进来,也不敢坐,介绍着自己,说什么我也不能完全懂,只辨认出是凌晨就坐了车……他开始掏塑料袋,从那一堆报纸里找自己的作品,找出来厚厚的一摞横格稿签,密密麻麻地写满圆珠笔字。他说三万字,是三万,写了好久,干完活就写。我说太长了,超过

了我们接纳的字数。他好象拒绝听见这个,他说你删,删到你们要的数字。我说没法帮你删掉两万呀。他愣住了,微黄的眼珠一下失了神,看着我,暗暗的脸和落满灰的头发也全向着我。我真是受不得那样的眼光,好像我当面杀掉了他的孩子。我尽量让自己语气温婉再温婉,给了他一些意见,让他坐一会,他也就多坐了一会,很勉强很无所适从地坐在那里,然后起身提着他的塑料袋默默地走了。我一直记得他裤腿后面的泥,想象着他多么亢奋地穿越迷蒙晨雾,奔上一趟开往南京的班车。

还有一个极胖的老头,“哼哧哼哧”直奔了进来。我惊讶地看着他,他说我想寄可是不放心,我正好骑自行车路过的,想放在传达室,也不放心,所以就上来了。他说我发表过好多作品的,你看你看,他一边抓出一大堆报纸复印件递给我,那些纸上的字被他的手一碰就晕染开了。他又抢过我的笔,一笔一画地写他的通联方式,写完还反复检查,划掉一个号码斟酌着写上另一个号码……我看看他的地址,跟编辑部几乎隔着一座城,在那样的炎夏,他是怎么“正好”骑车从城东北路过城西南的呢?

很多时候想想这些人,心里会泛酸,是应该敬佩的,哪怕他们好多穿得并不体面,活得也许也不体面,却有着别人也许不能理解不可思议的坚持,一直写一直写,就算发表过很多很多小豆腐块,但名字和文章就像他们的人一样,转身进入人海,便无法分辨无人记得了。

有多少人能从自己的字里在生活中体面起来? ■



等候
摄/谷以成